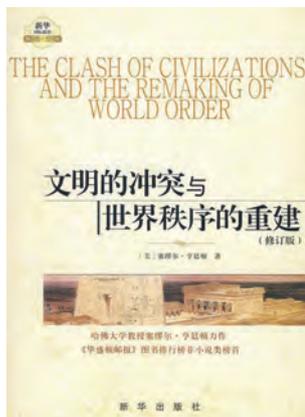




它们都用二元的、非我即彼的眼光看待世界；它们又都是普世主义的，声称自己是全人类都应追随的唯一真正信仰；它们都是负有使命感的宗教，认为其教徒有义务说服非教徒皈依这唯一的真正信仰。自创始起，伊斯兰教就依靠征服进行扩张，只要有机会，基督教也是如此行事。‘圣战’和‘十字军东征’这两个类似的概念

不仅令它们彼此相像，而且将这两种信仰与世界其他主要宗教区别开来。伊斯兰教、基督教和犹太教还持有一种目的论的历史观，与其他文明普遍持有的轮转或静态观完全不同。”

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伊斯兰国家的整个趋势是反西方的。这部分是伊斯兰复兴运动所造成的。亨廷顿认为，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，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——伊斯兰，它的人民坚信自身文化的优越性，并担心自己的力量处于劣势。伊斯兰面临的问题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，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——西方，它的人民确信自身文化的普遍性和优越性，尽管他们的优势正在下降，但这一优势仍然使他们有义务把他们的文化扩展到全世界。这些是造成伊斯兰和西方冲突的根本因素。



亨廷顿和他的著作。

文化”形成了挑战，从而让美国人产生了“民族认同危机”。

亨廷顿的这本书可以说是他的世界“文明冲突论”之理论框架的缩小版，即美国本土的“文化冲突论”。前者要回答的是西方文明背景下的“我们是谁”和如何应对挑战，后者要回答的是美国文化背景下的“我们是

谁”和怎样应对挑战。

作为一个移民国家，美国国内不同种族不同族裔长期共存，他们的文化背景——黑人、拉美裔、亚裔等群体的亚文化——与美国“核心文化”（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）是有冲突的，这就必然形成矛盾。这似乎在形成美国这个国家的最初就埋下了日后矛盾的导火索，那么如何解决这个矛盾？首要的，就是要放弃“白人至上”的种族主义立场。如果仍然立足于这种种族主义的立场，必然会使得不同种族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，不利于美国这个民族大熔炉的融合。

我们是谁？你们是谁？他们又是谁？在我们、你们和他们之间，各自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背景的差异，造成了你我他之间的隔阂与分歧，在当今世界上，如何认识自我、尊重对方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问题，更是一个棘手的难题。

很显然，《我们是谁》是在《文明的冲突》一书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思考，在亨廷顿看来，从国际到国内，各种的社会矛盾的根源，仍然是文明的冲突。面对文明的冲突，急需建立的对话的途径和机制。但这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，背后牵涉的问题方方面面，需要各方面的努力，恐怕也需要时间。而亨廷顿本人已经等不到世界和解的这一天了。

2008年圣诞节前夜，亨廷顿在波士顿去世，享年81岁。被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亨利·罗索夫斯基誉为“他显然是过去50年中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学家之一”的亨廷顿走了，但文明的冲突仍在加剧。2021年是联合国文明对话年20周年。伊朗前总统哈塔米于1998年9月在第53届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时首次提出“文明对话”倡议，同年11月4日联大一致通过决议，将2001年命名为“联合国文明对话年”。希望在未来，文明的对话能代替文明的冲突，让和平成为世界的主流，这才是不同文明共存的最好基础……

我们是谁？

2001年在纽约发生的“9·11”恐怖袭击事件残酷实现了亨廷顿的预言，文明的冲突正在演化为人间的悲剧。而在“9·11”事件后，亨廷顿又撰写出版了《我们是谁：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》，这是他最后完成的两本书之一，针对美国的移民问题大发议论，同样引起一片争议。

在这本书中，亨廷顿将“文明冲突”的视角由国际转向美国国内，“美国国家特性”所受到的种种“挑战”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就是“伊斯兰好斗分子”成为了美国现实中的头号敌人，这就是美国在21世纪初所处的国际形势。

“我们是谁”这个题目是个经典论题。金庸的小说《侠客行》和成龙的电影《我是谁》都讨论过这样的命题：“我是谁？”其背后是身份认同困惑。亨廷顿注意到，“9·11”前后，在美国国内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造成的“有色人种”对美国“核心